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6. 2

VOL.19 NO.2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4月15日出版

2026年第2期 总第110期

●专栏：公共服务创新与服务效能

中国公共服务40年的政策变迁与创新：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

..... 郭宁 姜晓萍 1

政民距离如何影响公民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 杜娟 李子妍 朱旭峰 19

网上政务服务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 杜亚斌 马亮 38

●论文

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与生成机制：基于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追踪分析

..... 满小欧 杨扬 59

微观叙事政策框架下的政策认知与认同

..... 莫启星 邵梓捷 78

“党领协作”：党建统筹下重大项目的协作模式与组织机理	王 铮	95
街区治理共同体：城市基层治理的场域扩张与主体重塑	顾丽梅 李雨荃	114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棘手问题”：基于房屋征收事件的案例研究	林 彬 文 宏	134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刘巧兰 骆 飞 王丛虎	155
●理论综述		
地方官员的任期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	李 璨 王雨洁	176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刘巧兰 骆 飞 王丛虎*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政府监管体制转型带来全新挑战，政府需要根据组织外部情境的变化，权变式地推进监管体制改革。然而，监管体制的权变式改革能否提升监管效能，其权变特征与改革效应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亟待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与公共资源集中化交易相匹配的统一监管改革为理解权变式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基础。论文聚焦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最高、要素资源集聚性最强、监管体制改革最前沿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运用准实验研究方法，对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预防腐败，能使所在城市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减少约4人，腐败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当统一监管覆盖两类交易项目时，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基于行政划转方式实现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比地方立法授权方式具有更显著的腐败预防效果。论文为理解政府部门推进监管体制转型与外部情境之间的匹配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实证检验了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转型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公共资源交易 统一监管 政策评估 腐败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55-21

一、引言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深化，要求其监管体制必须与高度集中的交易平台运

* 刘巧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骆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王丛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委会和编辑部对论文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统一平台运行下公共资源交易腐败治理机制：模型检验与实现路径”（72274199），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资助。

行模式相适应（王丛虎、马文娟，2020）。从权变视角出发（朱国云，2014），将分散监管转向统一监管，即由一个综合监管机构统一负责多种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的监管执法，被视作适应这种平台整合情境的一种关键性制度调适（王丛虎、刘巧兰，2022）。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实现“管办分离”，构建运行权与监管权的有效制衡机制（赵立波、朱艳鑫，2014）。在理论预期上，这种旨在匹配集中交易情境的统一监管转型，被普遍认为能通过减少不当干预空间来降低腐败的风险（纪杰，2013；王丛虎、刘巧兰，2022）。这与各地各级纪委、监委为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而着重抓好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系统整治的工作相契合。

然而，关于统一监管转型能否真正产生预防腐败的积极效应，学界存在显著的理论分歧，亟须实证证据支撑。支持者认为，统一监管能提升监管合力与适应性，从而有效预防腐败（赵立波、朱艳鑫，2014；王敬波，2022）。反对者则担忧监管权力集中化本身可能加剧系统性腐败的风险（汪晓林、王丛虎，2017；何增科，2017；王尘子，2021）。

既有研究为理解统一监管转型的逻辑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均属于规范性理论推演，未能基于经验数据对统一监管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检验，尤其缺乏对其潜在的预防腐败效应的实证检验。具体而言，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有效降低腐败风险？回答这一问题，对深化组织权变理论的应用、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聚焦处于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前沿的长三角地区，运用准实验方法，旨在实证检验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转型对于预防腐败的实际效果，以期弥合理论分歧，并为理解监管体制改革与治理目标（如预防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证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转型对预防腐败的实际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论探究需要建立在一个能解释监管结构选择与组织效能（如腐败预防效果）之间关联性的普适性框架之上。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权变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组织效能的有效提升，高度依赖于组织结构（管理变量）与特定情境因素（环境变量）之间的适配程度（fit）（朱国云，2014；Van De Ven et al.，2013）。这种适配关系的内在逻辑是：当特定的环境条件存在时，那么与之相适配的组织结构安排将比其他安排更能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如提升效能、降低风险等（Luthans et al.，1976）。

结构与环境的匹配是组织高绩效的关键驱动力，反之则可能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失败（Donaldson, 1985）。

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已经基本完成从分散交易向集中交易的转变。具体来说，我国通过实践探索与政策推动，如2002年绍兴试点与2015年国务院强力整合，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高度集中化、统一化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王丛虎、马文娟，2020）。这种交易平台整合、执行机构统一及交易流程标准化的集中运行模式构成了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最基本的情境特征（Kast, 1979）。

面对集中化交易这一核心环境变量，相应的监管组织结构应作何调整以实现匹配？权变理论强调，组织结构需与环境复杂性、动态性、依赖性等特征相适应（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7）。对于高度集中化的交易体系，由单一综合监管机构对公共资源交易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执法，被视为与该情境潜在的、理论上的适配选择，其逻辑在于统一监管与集中交易的匹配性。一方面，集中交易平台处理多元、综合性的交易项目，各部门分头监管的碎片化分散监管体制难以有效应对平台内部的交叉性问题和整体性风险。统一监管整合监管资源与权力，更契合集中平台的管理复杂度（王敬波，2022）。另一方面，集中化导致公共资源大量集聚和机构权力大幅扩张，“管办分离”成为内在要求。统一监管通过分离交易运行权（交易中心）与监管权（综合监管机构），构建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机制，理论上可减少运行机构被特定行业“俘获”或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赵立波、朱艳鑫，2014）。换言之，统一的运行平台需要与之配套的整合性监管框架，分散监管易与集中化趋势背道而驰，造成市场规则和执行标准的人为割裂。

提升监管效能是监管组织适配环境变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预防腐败受到高度关注，并被政策层面明确列为关键治理目标。权变理论主张，环境与结构的有效匹配应能显著提升组织实现其核心目标的能力。因此，统一监管与集中交易情境的有效匹配，理论上应能通过强化权力制衡、减少干预节点、增强规则统一性和监管协调性，从而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空间和潜在风险，进而提升预防腐败的效能（纪杰，2013；王丛虎、刘巧兰，2022）。

尽管权变理论为统一监管作为集中化情境的潜在适配方案以及其可能提升预防腐败的效能提供了一般性的逻辑支撑，但这种理论预期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显著争议，尤其是在预防腐败的效果上。那么，权变理论所预期的通过结构与环境匹配进而实现预防腐败效应提升的逻辑链条能否在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转型的具体实践中被观察和证实？

本文基于权变理论的一般性命题，即匹配会提升效能，结合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的核心情境特征（集中交易）、潜在适配结构（统一监管）以及核心效能目标（预防腐败），提出如下一般性待检验的理论命题：作为与集中化情境结构相匹配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具体体现为降低交易过程中的腐败风险水平。后续的假设将基于此基础性命题进行更精确的异质性探究。本文旨在权变理论的框架下，为理解特定制度安排在特定情境中对特定治理目标的作用效果提供经验证据。统一监管改革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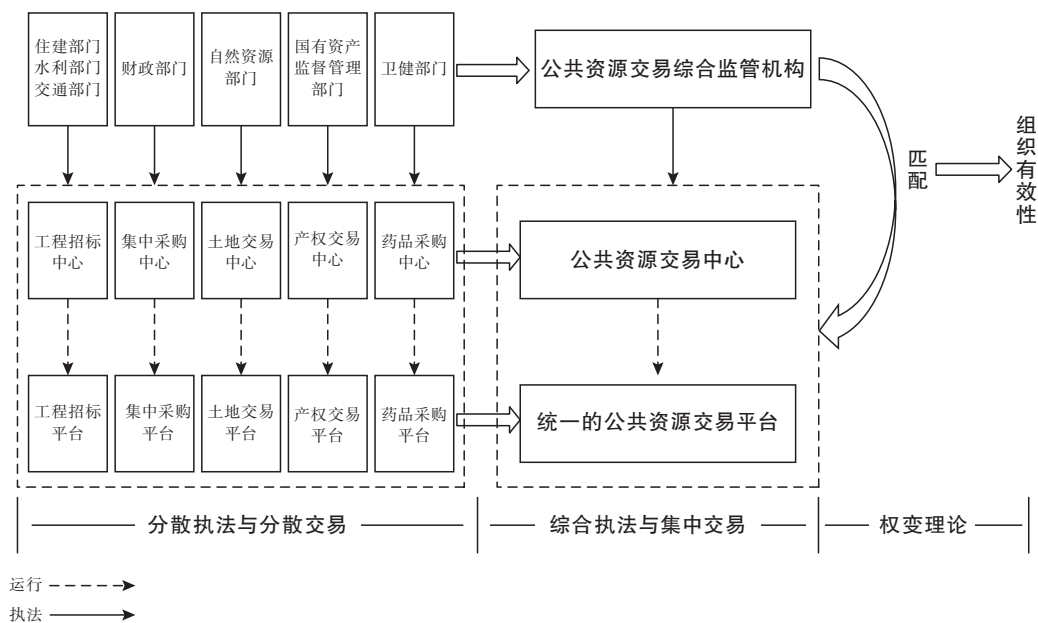


图 1 基于权变理论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研究假设

权变理论认为，结构与环境的有效匹配能显著提升组织实现目标的能力（Donaldson, 1985）。从理论上讲，集中交易实现了交易项目整合、交易规则统一、交易流程公开及交易信息汇聚，统一监管与其实现了有效衔接和协同，更能有效地识别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纪杰，2013；王丛虎、刘巧兰，2022）。同时，统一监管的核心逻辑在于实现运行与监管的职能分离，即交易中心与综合机构职能分离，消除“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内在冲突（赵立波、朱艳鑫，2014），减少同一主体干预市场的行为和权力寻租的空间（张玉磊，2016）。统一监管整合监管资源与执法权责，解决了分散监管固有的标准不一、职责交叉、协调困难等碎片化问题（王敬波，2022），提高了监管行动的及时性、一致性与威慑力，增加了违规行为被发现、被惩罚的概率，以此达到预防腐败的目标。但仍有部分学者担心，统一监管导致的权力集中可能加剧系统性腐败风险。对此，我们认为，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实现了管办分离，这对于监管权的制衡作用及其产生的其他正向效应将极大削弱监管权力集体性寻租的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

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执法基础与腐败存量存在系统性差异（Cai et al. , 2011）。在腐败问题严重、治理基础薄弱的地区，引入统一监管所建立的新规则、新权力制衡机制和更强监管执行力，其所带来的新增约束作用和边际改善效果更大（Becker, 1968；陈抗等，2002）。相较于原本已有较为健全的监管机制的地区，统一监管为高腐败地区提供了一种“制度强化”（Institutional Reinforcement）机制（Andrews, 2013），填补治理真空，其效能提升的空间更为显著。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例如，Treisman（2007）发现，制度干预在腐败热点地区更有效。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权变理论强调组织结构必须与外部情境的复杂性相匹配以实现高效能（迈克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7；Van de Ven et al. , 2013）。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集中化平台整合多类型交易项目，情境复杂性对监管范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一方面，统一监管范围过宽，容易超出单一监管机构的处理能力与专业认知边界，导致监管泛化、专业性不足和效率下降（刘俊杰，2005）。这反映了组织理论中的“控制跨度”（Span of Control）问题（Mintrom, 2016），即管理幅度过大会引发信息过载和决策质量下降。同时，范围过宽可能过度集中监管权，若内部制衡机制缺失，会增加系统性腐败的风险（汪晓林、王丛虎，2017；何增科，2017），这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关于权力集中带来的治理成本上升的观点一致（Williamson, 1975）。另一方面，统一监管范围过窄，如仅覆盖单一类型项目，难以匹配集中平台的复杂环境，无法解决跨项目的协调问题，导致监管碎片化和权力寻租（Van de Ven et al. , 2013）。与此同时，协调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难以下降（Williamson, 1975），由此削弱权变匹配的整体效能。Kahneman 和 Tversky（1979）的决策理论中的收益与风险权衡，以及 Armstrong 和 Sappington（2007）关于监管规模的研究发现，监管范围对腐败预防效果的影响呈现“倒 U 形”曲线：初期范围扩大会产生边际收益，如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但超过阈值后边际成本上升，如专业能力稀释、协调难度增加。在中国案例中，赵立波、朱艳鑫（2014）也提出监管整合的“适度原则”。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存在一个最优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范围，在此范围内，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偏离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

在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已形成“立法授权”和“行政

划转”两种差异化路径。前者是指，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执法权限统一授予综合监管部门；后者是指，利用部门“三定”方案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行政手段，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执法权从行业主管部门划转到综合监管部门。基于 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差异化路径在本质上代表着制度变革层次的不同，可划归为“强制性变迁”与“渐进式调整”。两种改革路径的核心差异在于对传统部门分割监管体制的突破程度，进而影响腐败的预防效果。立法授权通过法律权威打破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造，行政划转易受原有制度惯性的制约。具体而言，立法授权属于法律层面的原则性、彻底性变革，通过顶层规则重构制度框架、权力配置和机构职责，实现对传统行业分散监管体制的根本性突破。这种方式以地方性法规形成制度锁定效应（谭喻，2024），确保了统一监管体制的稳定性和长效性，并通过清晰界定权责边界的方式（Sunstein，1990），为监管机构独立性提供制度保障，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相比之下，行政划转则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推进监管体制调整，但其法律位阶较低，在具体实践中可能面临合法性质疑；稳定性受行政意志影响较大，持续性可能较弱（张明玖等，2022）；且权责界定存在模糊地带，未能彻底切断与原分散部门的潜在联系，原部门隐性权力的介入可能削弱统一监管的效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以“行政划转”或“立法授权”路径推进的统一监管，其腐败预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with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评估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的效果，即能否预防腐败。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是评估政策变化因果影响的最流行的研究设计之一（Callaway & Sant’Anna，2021）。双重差分能消除随时间而变化的选择性偏差，识别可靠的因果关系，它的思路是将新政策视为一项准实验，将实施新政策的研究样本作为实验组，未实施新政策的样本作为对照组，且实验组和对照组必须满足趋势一致性，即如果没有外部冲击，两组样本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如此一来，实施外部干预后，实验组区别于对照组的变化即外部干预带来的效果。

本文根据当地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将研究样本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比较实施统一监管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腐败发生率上的差异，从而检验统一监管的效果。由于实验组各城市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

监管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多期 DID 模型，参照 Thorsten Beck 等（Angrist & Pischke, 2009；Beck et al., 2010）的做法，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corrupt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_{it} + \alpha X_{it} + \lambd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式（1）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 $corrupt_{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腐败发生率， α_0 为常数项， did_{it}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如果城市 i 在 t 年实施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模式为统一监管，则 $did_{it}=1$ ，否则为 0； X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γ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α_1 是本文的核心参数，它衡量的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发生率的净效应，如果 α_1 显著为负，那么本文提出的假设“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将得到验证。

（二）样本选择

根据政策梳理和实地调研，截至 2023 年底，就地级市层面而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的城市分布在安徽省和浙江省。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市作为样本，研究的时间范围划定在 2018—2023 年^①。将实施统一监管的安徽省和浙江省下辖地级市作为实验组样本，其他未实施统一监管的地级市作为对照组。在安徽省，宿州和池州两个地级市仍维持公共资源交易行业分散监管体制，纳入对照组；其余 14 个地级市均通过行政区划或地方立法授权的方式进行统一监管体制改革，纳入实验组。在浙江省，湖州市和宁波市分别在 2017 年和 2020 年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纳入实验组；其余 9 个地级市均延续行业分散监管体制，纳入对照组。在江苏省，13 个地级市均为行业分散监管体制，纳入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由于绍兴、镇江、泰州、连云港、淮安、宿迁 6 个城市数据缺失严重，本文不纳入研究样本。针对数据缺失较少的城市，本文采用插值法补齐。考虑到上海是直辖市，具有全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等特殊功能定位，本文没有将上海市纳入研究样本。由此，本文确定了最终的研究样本，包括 16 个样本的实验组和 18 个样本的对照组（见表 1）。

^① 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2018 年及以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避免反腐力度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存在差异而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将样本数据限定为 2018 年及以后。进一步考虑到其他影响各城市反腐败力度的因素，本文还将中央巡视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第二，本文拟用“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来测量因变量“腐败发生率”。2017 年 11 月 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正式发布，因此，2018 年及以后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统计年鉴对于职务犯罪人数的统计口径从“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职务犯罪人数”转变为“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为确保统计口径前后一致，本文将研究时间限定为 2018 年及以后。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基本情况

序号	城市	统一监管 年份	实验组		对照组
			统一监管范围	统一监管 路径选择	
1	黄山	201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2	合肥	2013	建设工程、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出让	立法授权	
3	淮南	2015	建设工程、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出让	立法授权	
4	蚌埠	201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道路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土地交易、政府采购、电力设施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5	淮北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矿业权出让、国有及其他产权交易	行政划转	宿州 池州
6	马鞍山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土地矿产资源交易	行政划转	杭州 嘉兴
7	滁州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土地交易	行政划转	金华 温州
8	亳州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土地交易	行政划转	舟山 台州
9	宣城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丽水 衢州
10	六安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南京 苏州
11	芜湖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无锡 常州
12	铜陵	202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南通 扬州
13	阜阳	202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农田建设工程	行政划转	盐城 徐州
14	安庆	202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方面、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5	湖州	2017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交通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国土、产权、矿业权交易；环境权益、大型户外广告、小车吉祥号牌等	行政划转	
16	宁波	2020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	立法授权	

注：作者经多轮实地调研和政策梳理自制而成。按所属省份首字母排序，同一省份的地级市则按统一监管年份从早到晚排序，改革年份相同则按统一监管范围从大到小排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无偏性，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需要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随机性和趋势一致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是安徽省和浙江省部分地级市的自主选择 and 主动探索。进行此项改革，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腐败程度

高于其他地级市，而是基于成熟的客观条件、当地领导者的创新精神和改革魄力等。因此可以认为，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并不是以当地腐败程度高低为依据，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研究样本符合双重差分的分组随机性前提假设。第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需要满足实验组和对照组趋势一致这一前提假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这一项外部冲击，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腐败发生率上应该有一致的变化趋势。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地理位置毗邻，战略地位相似，经济开放程度相近，资源禀赋类似，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规模、活跃度和规范化程度相仿。而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战略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城市的协同发展。因此，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很有可能满足发展趋势一致的条件。后文将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实施统一监管前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趋势一致这一前提条件。

（三）主要变量及其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腐败发生率 (*corrupt*)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借鉴已有实证研究的做法 (Del Monte & Papagni, 2001; 王勇等, 2019; 梁城城、张淑娟, 2020), 本文用“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来衡量腐败发生率, 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向下取整。职务犯罪数据来源于各市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 并以各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和验证。2018年, 我国实施监察体制改革后, 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统计年鉴对职务犯罪人数的统计口径为“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公职人员数量来自市统计年鉴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内从事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组织工作的就业人员数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本文使用“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来测量实际腐败人数可能会受到质疑, 因为腐败定罪数量仅仅是实际腐败数量的“冰山一角”, 体现了反腐败力度和成效, 并不等同于实际发生的腐败数量 (Glaeser & Saks, 2006; Zhang & Kim, 2018; 倪星, 2011)。但相关研究表明, 被定罪的官员腐败数量与反腐败和执法力度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 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腐败程度的有效指标 (Liu & Mikesell, 2014; Liu et al., 2017)。况且, 政府反腐力度事实上是同腐败状况密切相关的, 力度的增强往往是对腐败状况恶化的回应, 把两者截然分开恐有不妥 (公婷、吴木銮, 2012)。鉴于此, 本文用“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作为实际腐败人数的替代测量具有一定合理性。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did* 是反映某一城市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虚拟变量, 它是组别虚拟变量 *treated* (实验组城市赋值为 1, 对照组城市赋值为 0) 和时间虚拟变量 *time* (统一监管发生当年及以后赋值为 1, 统一监管发生前赋值为 0) 的交互

项。只有 *treated* 和 *time* 同时为 1，解释变量 *did* 才等于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影响腐败发生率的因素，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选取一系列控制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 (*agdp*)，用地区人均 GDP 来衡量。有研究发现，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形”曲线关系 (李国璋等, 2010); 也有研究表明，人均 GDP 与地区腐败呈正相关 (潘春阳等, 2011); 还有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副省级城市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腐败水平有消减作用 (倪星、陈珊珊, 2013)。二是经济开放度 (*open*)，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多数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内生产商垄断市场的可能性越小，官员可以从中攫取的非法利润越少 (Treisman, 2007)。跨国研究同样表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会伴随着其经济开放度的提升而逐渐下降 (Ades & Di Tella, 1999)。三是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wage*) (Van Rijckeghem & Weder, 2001; 周黎安、陶婧, 2009)，以地区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全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衡量 (万广华、吴一平, 2012)。目前，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增加公务员工资有助于降低腐败 (Herzfeld & Weiss, 2003)。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腐败案件随着公务员薪酬的上升而增加 (公婷、吴木銮, 2012)。还有研究证实，提高公务员工资会减少小额腐败，但不会减少大额腐败 (Liu et al., 2025)。四是政府财政透明度 (*ftrans*)。财政透明能显著降低腐败立案数 (杜亚斌, 2020)。但整个过程非常复杂，透明度对腐败的有益影响取决于透明度的类型 (Bauhr et al., 2020)。借鉴肖兴志等 (肖兴志、王伊攀, 2014) 的做法，政府财政透明度来源于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五是换届年份 (*transition*)。中国干部人事制度中的政治流动性决定了地方领导人的激励和行为 (Zhu & Zhang, 2019)。在地方党政机关换届之际，腐败立案和处分数常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 (倪星、孙宗锋, 2015)。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transition*，当年份为 2022 年时，设置 *transition* = 1，否则为 0。六是反腐败力度 (*anti-corrupt*)，用中央巡视情况表示。反腐败力度会对腐败发生率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时间限定在 2018 年及以后，是为了控制党的十九大前后反腐败力度的差异。当然，各地在具体的腐败治理行动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尤其是中央巡视带来的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中央巡视情况^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

^①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在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范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内，党中央共开展 11 次巡视工作，其中十九届中央开展 9 轮巡视，二十届中央开展 2 轮巡视。其中，2018 年 2—5 月，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进驻省份包含江苏省；2018 年 10—11 月，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进驻省份包括安徽省；2020 年 10—12 月，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进驻省份覆盖浙江省、安徽省。

中。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inspection*，将中央巡视组进驻省份所辖全部地级市当年的 *inspection* 值设为 1，其余为 0。对反腐败力度进行控制意味着各地反腐败力度相当，则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人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当地的腐败程度，也就能直接呈现当地腐败预防效果。有效回应了“腐败发生率反映的是反腐力度而不是腐败程度”这一质疑。

（四）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检验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包括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5，证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五）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验证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腐败程度在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之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使用 Jacobson 等（1993）提出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corrupt_{it} = b_0 + \sum_{j=1}^j \beta_{pre_j} did_{ipre_j} + \sum_{k=1}^k \beta_{post_k} did_{ipost_k} + b_{current} did_{icurrent} + \beta X_{it} + \lambda_t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pre_j* 表示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前 *j* 年，*post_k* 表示实施统一监管后 *k* 年，*current* 为实施统一监管当年。根据交互项 *did_{ipre_j}* 的回归系数 β_{pre_j} 的显著性判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施统一监管之前是否存在差异，进而判断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图 2 反映了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前 3 年和后 13 年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短虚线）。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以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实施前 1 年作为基准期，因此式（2）和图 2 不包括 *pre_1* 的数据。可以看到，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之前，*did_{ipre_j}* 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 9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施统一监管前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实

① 受篇幅限制，此处未详细汇报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qiaolanliu@gxu.edu.cn）。

② 受篇幅限制，此处未详细汇报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施统一监管后， did_{ipost_k} 的估计系数大多为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绝对值越来越大。在实施统一监管后的第 9 年，交互项的系数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负，说明统一监管有助于降低腐败发生率，但其效用显现具有较长的滞后期。可能的原因在于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需要历经机构成立、制度设计、机制构建、权责设定、人员配备等多方面安排，与各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及组建综合执法队伍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由此导致统一监管改革效果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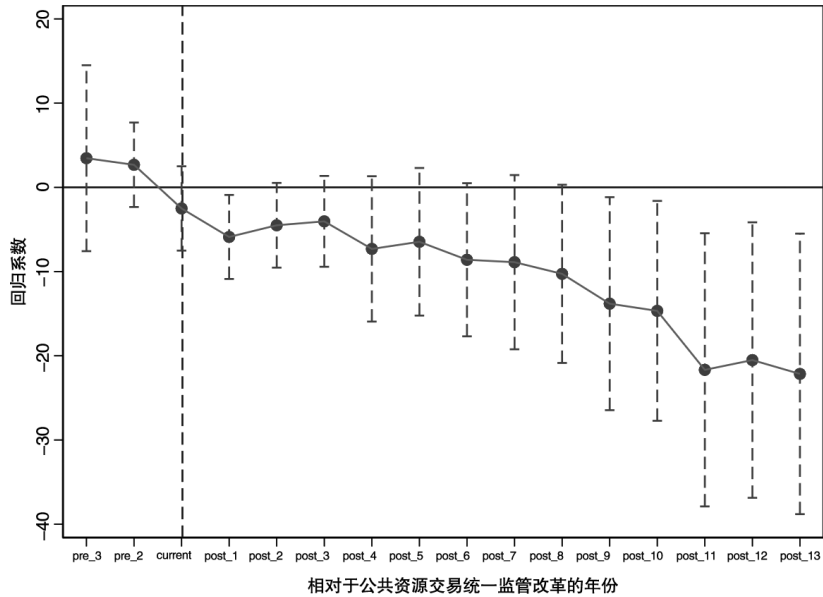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预防的净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第 (1) 列和第 (2) 列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H1 获得支持。基于第 (2) 列可以预测，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促使所在城市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减少约 4 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corrupt</i>	
	(1)	(2)
<i>did</i>	-4.421 *** (-3.09)	-4.176 *** (-2.91)
<i>agdp</i>		0.895 (1.58)
<i>open</i>		-30.673 *** (-2.68)
<i>wage</i>		0.677 (0.31)
<i>firans</i>		-0.058 (-1.18)
<i>transition</i>		0.313 (0.14)
<i>anti-corrupt</i>		1.947 (1.42)
常数项	11.856 *** (14.14)	7.134 (1.1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4	204
R^2	0.065	0.12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稳健性检验

尽管前文证实了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降低腐败发生率，但这一结论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等问题的干扰，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此，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PSM-DID 检验、剔除省会城市及排除极端值影响等一系列检验，估计结果依旧稳健，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①。

① 受篇幅限制，此处未详细汇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四)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验证了 H1 的正确性，也就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预防腐败。然而，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性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1. 腐败程度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 34 个城市在 2018—2023 年内每万名公职人员中的职务犯罪总人数进行计算，并采用两种分组方式。一是根据职务犯罪总人数，本文将 34 个城市平均拆分为腐败程度高与低的两个组别，每组包含 102 个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3 第 (1)、(2) 列与第 (5)、(6) 列。二是根据职务犯罪总人数，本文将 16 个实验组城市平均拆分为腐败程度高与低的两个组别，而不对 18 个对照组城市进行拆分，即将所有对照组城市纳入回归分析，由此形成的两个组别分别包含 156 个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3 第 (3)、(4) 列与第 (7)、(8) 列。结果显示，无论腐败程度高低，添加控制变量与否，*did*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预防起到正向作用。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did* 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腐败程度较低的组别。综上，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且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H2 得到有效验证。

表 3 基于腐败程度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i>corrupt</i>							
	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				腐败程度较低的城市			
	(1)	(2)	(3)	(4)	(5)	(6)	(7)	(8)
<i>did</i>	-5.535** (-2.21)	-4.801* (-1.88)	-6.223*** (-2.97)	-5.473** (-2.56)	-3.643** (-2.37)	-3.139** (-2.04)	-4.145** (-2.33)	-4.121** (-2.30)
<i>agdp</i>		1.356 (1.21)		1.004 (1.52)		0.738 (1.05)		0.485 (0.77)
<i>open</i>		-28.183* (-1.98)		-30.911** (-2.55)		-83.476** (-2.39)		-26.828** (-2.37)
<i>wage</i>		3.394 (0.99)		0.758 (0.32)		-2.639 (-0.93)		-0.306 (-0.14)
<i>ftrans</i>		-0.127 (-1.47)		-0.053 (-0.89)		-0.019 (-0.33)		0.001 (0.01)
<i>transition</i>		-0.520 (-0.15)		0.385 (0.16)		0.465 (0.16)		1.697 (0.71)
<i>anti-corrupt</i>		2.377 (0.99)		1.866 (1.22)		0.712 (0.44)		1.735 (1.22)

(续上表)

变量	<i>corrupt</i>							
	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				腐败程度较低的城市			
	(1)	(2)	(3)	(4)	(5)	(6)	(7)	(8)
常数项	15.330*** (10.69)	8.102 (0.85)	12.026*** (12.02)	5.973 (0.83)	8.487*** (9.23)	9.963 (1.21)	9.473*** (10.39)	5.892 (0.8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2	102	156	156	102	102	156	156
R^2	0.083	0.179	0.090	0.158	0.093	0.192	0.094	0.14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导致的腐败预防效果差异，根据当前实践情况，本文将 16 个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仅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监管的城市，包括黄山、宣城、六安、芜湖、铜陵、阜阳、安庆和宁波，均是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管；第二组是对两类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的城市，包括马鞍山、滁州和亳州，均是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和土地交易两大类进行监管；第三组是对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的城市，包括蚌埠（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交易、政府采购）、淮北（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交易、产权交易）、湖州（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交易、产权交易）、合肥（建设工程、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出让）、淮南（建设工程、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土地出让）。

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无论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覆盖几类交易项目，估计系数都为负数。当覆盖一类和两类交易项目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后者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前者，这就意味着对两类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时，腐败预防效果更显著。当统一监管范围覆盖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时，估计系数同样为负，但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H3 得到证实，即存在一个最优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范围，在此范围内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偏离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监管的效果不如两类交易项目的可能原因在于，仅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监管难以在监管平台运行、技术应用、数据共享及人员配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而对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又可能导致两个新的问题。一是统一监管机构面临综合性事务繁重、专业化水平不足等挑战，阻碍了监管效能的提升；二是统一监管机构覆盖监管范围

过大，导致监管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增加新的腐败风险。

表 4 基于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i>corrupt</i>					
	统一监管范围					
	覆盖一类交易项目		覆盖两类交易项目		覆盖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	
	(1)	(2)	(3)	(4)	(5)	(6)
<i>did</i>	-4.450*** (-2.66)	-4.178** (-2.47)	-6.917*** (-2.74)	-7.198*** (-2.76)	-6.625 (-1.48)	-5.932 (-1.32)
<i>agdp</i>		0.803 (1.32)		0.209 (0.30)		0.900 (1.28)
<i>open</i>		-27.029** (-2.40)		-26.661** (-2.30)		-29.948** (-2.40)
<i>wage</i>		-0.341 (-0.15)		0.182 (0.08)		0.529 (0.22)
<i>ftrans</i>		-0.032 (-0.54)		0.038 (0.56)		-0.020 (-0.32)
<i>transition</i>		0.862 (0.37)		3.217 (1.22)		0.435 (0.17)
<i>anti-corrupt</i>		1.918 (1.35)		1.753 (1.14)		1.470 (0.92)
常数项	9.902*** (10.94)	5.579 (0.83)	9.524*** (9.34)	5.355 (0.69)	11.152*** (8.50)	4.178 (0.5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6	156	126	126	138	138
R^2	0.106	0.169	0.162	0.223	0.074	0.136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路径选择异质性分析

本文聚焦于改革中后期的路径选择，将 16 个实验组样本分为行政划转组和立法授权组，前者包括黄山、蚌埠、淮北、马鞍山、滁州、亳州、宣城、六安、芜湖、铜陵、阜阳、安庆、湖州，后者包括具有地方立法权限的合肥、淮南、宁波。表 5 显示，*did*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这意味着运用行政划转或立法授权推动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发生率都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前者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后者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这一实证结果与“立法授权比行政划

转具有更显著的改革效果”的初期理论推演存在一定出入，但这一结论可能受到立法授权样本数量较少的客观限制。因此，本文认为，H4的核心观点——以“行政划转”或“立法授权”路径推进的统一监管，其腐败预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得到了验证。

表 5 基于路径选择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i>corrupt</i>			
	统一监管路径选择			
	行政划转		立法授权	
	(1)	(2)	(3)	(4)
<i>did</i>	-4.680*** (-3.10)	-4.013*** (-2.63)	-4.438 (-1.06)	-5.043 (-1.18)
<i>agdp</i>		1.079* (1.84)		0.210 (0.29)
<i>open</i>		-30.917*** (-2.68)		-25.457** (1.32)
<i>wage</i>		0.454 (0.20)		-0.021 (-0.01)
<i>ftrans</i>		-0.080 (-1.51)		0.066 (1.02)
<i>transition</i>		0.097 (0.04)		2.556 (0.97)
<i>anti-corrupt</i>		1.965 (1.38)		1.566 (1.01)
常数项	11.808*** (13.59)	7.192 (1.14)	8.994*** (8.12)	3.555 (0.4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6	186	126	126
R^2	0.071	0.147	0.141	0.205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部门也在持续

推进监管体制转型。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过程中，集中统一的交易过程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公共资源交易的地方创新实践，本文发现，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权变式转型，即推动监管体制与交易模式相互匹配。换言之，在公共资源交易实现集中统一后，公共资源交易的监管也逐步实现集中统一。

本文基于组织权变的理论视角，聚焦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环节，以公共资源交易重点区域——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对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权变式改革的核心效能目标（预防腐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有利于预防腐败，能使所在地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减少大约4人，且腐败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第二，当统一监管覆盖两类交易项目时，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偏离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因此，在具体实践中，不能一味地追求统一监管范围的扩大，而需要综合考虑部门基础和能力，确定合适的监管范围和项目类别，并不断提升部门监管执法水平，为应对监管范围的扩大奠定基础。第三，与地方立法授权相比，通过行政划转实现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城市具有更明显的腐败预防效果。但这一结论也可能受到立法授权样本数量较少的客观影响。因此，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的统一监管没有最佳路径选择，各地需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因地因时选择行政划转路径或立法授权路径，以深入推进统一监管。

本文的理论意义与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创新性地提出权变式改革的分析模式与理论视角。本文聚焦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监管转型，关注监管体制与监管对象之间的匹配关系，将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范围中的政府监管体制转型与广泛应用于组织变革中的权变理论对接起来，并回应学术界关于为匹配集中交易情境而进行的权变式转型，即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达成预防腐败这一核心效能目标的分歧，为相关研究提供实证依据。其次，深化了监管视角下的权力配置与环境权变的动态平衡分析。本文聚焦于监管体制的权变式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管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权变式转型过程，其本身的绩效取决于集中化的监管权力配置能否与相应的监管对象形成匹配。也就是说，权力集中统一与分散制衡并无绝对优劣，而要综合考虑其与外界情境特征的匹配程度。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刻画了权力配置与环境权变的相关关系。最后，拓展了组织变革与预防腐败之间的关系解释。现有关于腐败治理的文献主要从如何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技术应用、建设廉政文化等角度展开，少有研究关注监管组织的体制变革与预防腐败之间的关系。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拓展空间。其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数量有限。但目前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16个地级市均已包含在本文的实验组中。我们期待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在更多城市推行，为实证检验提供更为充

足的数据和材料。日后，笔者将开展持续性研究，不断扩大样本规模。其二，综合监管机构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的载体，其基本职能、权责清单、隶属关系、组织架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应对不同行业间的差异和冲突等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系统地研究。

参考文献

- 陈抗、Hillman, A. L.、顾清扬 (2002).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经济学(季刊)*, (4): 111-130.
- Chen, K., Hillman, A. L., & Gu, Q. Y. (2002).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and Behavioral Change of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Helping Hand to the Grabbing Hand.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4), 111-130. (in Chinese)
-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2007). 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 张月等,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Crozier, M., & Friedberg, E. (2017). *Actors and System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Zhang, Y. et al Trans).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in Chinese)
- 杜亚斌 (2020). 财政透明能有效遏制腐败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5): 82-91+159.
- Du, Y. B. (2020). Can Fiscal Transparency Curb Corruption?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5): 82-91+159. (in Chinese)
- 公婷、吴木菱 (2012). 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 基于中国的经验.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117-129.
- Gong, T., & Wu, M. L. (2012). The Effect of Pay Raises on Corruption Preven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ublic Sector.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5): 117-129. (in Chinese)
- 何增科 (2017). 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He, Z. K. (2017). *Clean Politic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n Chinese)
- 纪杰 (2013).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新探索: 基于重庆市JB区的个案研究. *电子政务*, (11): 63-68.
- Ji, J. (2013). A New Exploration of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Platforms: A Case Study of JB District in Chongqing. *E-Government*, (11): 63-68. (in Chinese)
- 李国璋、陈宏伟、郭鹏 (2010). 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实证视角的检验. *财贸研究*, 21(1): 65-70.
- Li, G. Z., Chen, H. W., & Guo, P. (2010). The Kuznets Curve Effe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Test.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1(1): 65-70. (in Chinese)
- 梁城城、张淑娟 (2020). 非税收入规模、官员腐败与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商业研究*, (4): 85-92.
- Liang, C. C., & Zhang, S. J. (2020). Non-Tax Revenue Scale,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ata. *Commercial Research*, (4): 85-92. (in Chinese)
- 刘俊杰 (2005). 论人类文明的转型与权力制衡原则的演进.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5): 75-80.
- Liu, J. J. (2005).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ower Balance Principles.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5): 75-80. (in Chinese)
- 倪星 (2011). 中国廉政方略变迁及其效果分析. *政治学研究*, (5): 74-86.
- Ni, X. (2011).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Effects.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74-86. (in Chinese)
- 倪星、陈珊珊 (2013). 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与地区腐败——基于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3(6): 138-150.
- Ni, X., & Chen, S. S. (2013). Economic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Regional Corruption: Data Analysis of Sub-Provincial Cities from 2000 to 2010.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3(6): 138-150. (in Chinese)
- 倪星、孙宗锋 (2015). 经济发展、制度安排与地方反腐败力度——基于G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92-103.
- Ni, X., & Sun, Z. F. (201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Local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 Panel Data Analysis Based on G Province.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5): 92-103. (in Chinese)

- 潘春阳、何立新、袁从帅 (2011). 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基于 1999-200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代财经*, (3): 38-46.
- Pan, C. Y., He, L. X., & Yuan, C. S. (2011).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07. *Contemporary Finance & Economics*, (3): 38-46. (in Chinese)
- 谭喻 (2024). 我国授权立法的实践发展及类型分析. *人大研究*, (10): 39-45.
- Tan, Y. (2024).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Authorized Legislation in China. *People's Congress Studies*, (10): 39-45. (in Chinese)
- 万广华、吴一平 (2012). 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成效: 基于跨期腐败程度变化的研究. *管理世界*, (4): 60-69.
- Wan, G. H., & Wu, Y. P. (2012).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Anti-Corruption Effectiveness: A Study Based on Changes in Corruption Levels Over Tim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4): 60-69. (in Chinese)
- 王丛虎、马文娟 (2020). 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的行动策略研究. *治理研究*, 36(2): 100-109.
- Wang, C. H., & Ma, W. J. (2020). A Study on the Action Strategy of the Policy Diffusion of Public Resource Transaction. *Governance Studies*, 36(2): 100-109. (in Chinese)
- 王丛虎、刘巧兰 (2022). 公共资源交易实现基本公共价值的多重机制与实践面向——基于“工具-目标”的分析视角. *学海*, (4): 118-125.
- Wang, C. H., & Liu, Q. L. (2022). The Multiple Mechanisms and Practice Orientation of Realizing Basic Public Value in Public Resource Transa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ol-Target”. *Academia Bimestris*, (4): 118-125. (in Chinese)
- 王尘子 (2021). “结构-过程”视角下的系统性腐败生成机理研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3): 87-96.
- Wang, C. Z. (2021).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ystemic Corruption from the “Structure-Proc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3): 87-96. (in Chinese)
- 王敬波 (2022). 统一市场监管的法治道路. *中国行政管理*, (10): 6-8+11.
- Wang, J. B. (2022). The Legal Path to Unified Market Regulati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 6-8+11. (in Chinese)
- 汪晓林、王丛虎 (2017). 我国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模式比较与探析. *中国政府采购*, (7): 72-77.
- Wang, X. L., & Wang, C. H. (2017).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upervision Models of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in China. *China Government Procurement*, (7): 72-77. (in Chinese)
- 王勇、王鹏飞、张佐敏 (2019). 金融发展抑制腐败关系网的路径和机制. *政治学研究*, (6): 90-102+128.
- Wang, Y., Wang, P. F., & Zhang, Z. M. (2019).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training on Corrupt Guanxi Network.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90-102+128. (in Chinese)
- 肖兴志、王伊攀 (2014). 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9): 148-160.
- Xiao, X. Z., & Wang, Y. P. (2014).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Decision of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9): 148-160. (in Chinese)
- 张明玖、姜世文、王丛虎 (2022).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动力机制及路径选择——基于公共资源交易立法实践调研.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38(05): 13-21.
- Zhang, M. J., Jiang, S. W., & Wang, C. H. (2022).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and Path Selection of Local Initiative Legislat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Legislative Practices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Journal of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38(5), 13-21. (in Chinese)
- 张玉磊 (2016). 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研究——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Zhang, Y. L. (2016). *A Study of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Models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Fragmentation to Hol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赵立波、朱艳鑫 (2014). 公共资源交易管办分离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3): 21-25.
- Zhao, L. B., & Zhu, Y. X. (2014). Study on the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Running in Public Resource Transaction Reform.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21-25. (in Chinese)
- 周黎安、陶靖 (2009).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 *经济研究*, 44(1): 57-69.
- Zhou, L. A., & Tao, J. (2009). Government Siz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rrup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4(1): 57-69. (in Chinese)
- 朱国云 (2014). *组织理论: 历史与流派 (第二版)*.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Zhu, G. Y. (2014). *Organizational Theory: History and Schools (2nd Editio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Ades, A. , & Di Tella, R. (1999).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4) : 982-993.
- Andrews M. (2013). *The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Development: Changing Rules for Realistic Solu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grist, J. D. , & Pischke, J. S. (2009).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M. , & Sappington, D. E. M. (2007).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etherlands: Elsevier.
- Bauhr, M. , Czibik, Á. , de Fine Licht, J. , & Fazekas, M. (2020). Lights on the Shadows of Public Procurement: Transparency as an Antidote to Corruption. *Governance*, 33(3) : 495-523.
- Beck, T. , Levine, R. , & Levkov, A. (2010).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5(5) : 1663-1667.
- Becker, G. S.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 : 169-217.
- Cai, H. B. , Fang, H. M. & Xu, L. C. (2011).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4(1) : 55-78.
- Callaway, B. , & Sant'Anna, P. H. C.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 200-230.
- Del Monte, A. , & Papagni, E. (2001). Public Expenditure,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7(1) : 1-16.
- Donaldson, L. (1985). *In Defence of Organizations Theory: A Reply to the Cr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eser, E. L. , & Saks, R. E. (2006). Corrupt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6-7) : 1053-1072.
- Herzfeld, T. , & Weiss, C. (2003). Corruption and Legal (In)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 : 621-632.
- Jacobson, L. S. , LaLonde, R. J. , & Sullivan, D. (1993). Earnings Losses of Displaced Work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4) : 685-709.
- Kahneman, D. ,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 263-292.
- Kast, F. E. (1979).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 Systems and Contingency Approach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Liu, C. , & Mikesell, J. L. (2014). The Impact of Public Officials' Corruption on the Size and Allocation of US State Spen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4(3) : 346-359.
- Liu, C. , Mikesell, J. L. , & Moldogaziev, T. T. (2017). Corruption and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5) : 681-690.
- Liu, W. B. , Liu, Q. L. , & Wang, C. H. (2025). Higher Official Wages Reduce Petty Not Gr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8(4) : 599-616.
- Luthans, F. , Schonberger, R. , & Morey, R. (1976).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A Contingency Approach*. New York: McGraw-Hill.
- Mintrom, M. A. (2016). *Herbert A. Simo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s in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1990).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Chevron. *Columbia Law Review*, 90(8) : 2071-2120.
- Treisman, D. (2007).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 : 211-244.
- Van de Ven, A. H. , Ganco, M. , & Hinings, C. R. (Bob). (2013). Returning to the Frontier of Contingency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1) : 393-440.
- Van Rijckeghem, C. , & Weder, B. (2001).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 Do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ffect Corruption, and by How Mu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5(2) : 307-331.
-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Zhang, Y. H. , & Kim, M. H. (2018). Do Public Corruption Convictions Influence Citizens'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Answer Might Not Be a Simple Yes or No.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8(7) : 685-698.
- Zhu, X. F. , & Zhang, Y. L. (2019). Diffusion of Marketization Innov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in a Multilevel System: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9(1) : 133-150.

责任编辑：李佳源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9 No. 2, 2026

● SYMPOSIUM: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Forty Year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Public Services: A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 Ning Guo & Xiaoping Jiang

Abstract Equitable and accessible public services serve as a vital hallma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itute the social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280 national-level public service policy documents spanning from 1985 to 2025,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knowledge map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It presents and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s within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having undergone a gradient 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to "exploration of universal benefits" to "advancement towards equaliza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olicies demonstrate a four-dimensional dynamic pattern: demand progression, value realignm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of public servic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s;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Innovation; Knowledge Graph

How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ocial Survey Juan Du, Ziyang Li & Xufeng Zhu

Abstract A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improve, how to further enh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for both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government-citizen interactions makes it possible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center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redirect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ward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s a more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citizen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s a core concept, defining it as citizens' composit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develop and test competing hypothese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influences citizen satisfaction. Drawing on the 2019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 and manually collected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geographic and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higher the public's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whereas narrowing social distance does not lead to increased citizen satisfaction. Moreover,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through shaping public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reconstruct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government. Further,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varies with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ty. This study offers decision-makers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sources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upports more precise and responsive public management.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Citizen Expectations

How Do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 Yabin Du & Liang M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presents both new chances 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equity. There are still compe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equity. Using three waves of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 combined with provincial-level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influences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dual digital divid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st, provincial-level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with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 effectiveness playing crucial roles, while the process of service handling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Second,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promotes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including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erception of procedural fairness,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ird, while the digital access divide does not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 digital usage divide induced by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age differences leads to the varying impact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on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preliminary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 promot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ntingent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Digital Government; Social Equity;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Digital Divide

●ARTICLES

Strategy Type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Policy Redesign: A Process-Tracing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Xiaoou Man & Yang Yang

Abstract Policy design is a specific form of policymaking that shap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Combin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 rational-technical instrument and a value-oriented pursuit, it serves as a key link between policy intentions and policy practi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policy design elements at specific points in time, rather than treating policy design as an integrated whole and examining,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its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ver tim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olicy redesign and focuses on the robustness that policy design exhibits in the course of adjustment.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intervention targets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strategic types of policy redesign: static substantive redesign, static procedural redesign, dynamic substantive redesign, and dynamic procedural redesign. It further constructs a four-stage mechanism consisting of issue context, goal iteration, tool adaptation, and policy feedback to explain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policy redesign strategies. The study not only responds, at a theoretical level, to the classic question of how policy design evolves, but also reveals, at a practical level, how policy redesign is realized through adaptation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timely adjustment. Future policy design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ic robustness to dynamic adaptation,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policy adap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Key Words Policy Redesign; Strategy Type; Policy Change; Process Tracing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system increasingly relies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with policy narratives serving as a key guiding tool.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arratives influence policy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particular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rrative frames and an audience's prior knowledge. This study combines a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xperiment wi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mploying a 2 (episodic vs. thematic narrative frame) × 2 (high vs. low policy familiarity) within-subjects design (N = 60)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policy narratives at both physiological and subjective levels. Our core finding reveals a stark dissociation between physiological and attitudinal outcomes. At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episodic frame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stories, induced stronger neural activity than thematic frames presenting macro-data. At the attitudinal level, however, this neural advantage vanished.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nal policy acceptance or information memory, while prior policy familiarity emerged as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these outcomes. We further found that watching policy news in an official media form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articipants' overall emotional arousal. We thus propose a "trigger"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is paradox: in the low-arousal context created by official media, policy narratives fail to facilitat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instead merely activating audiences' preconceived judgments based on prior experience,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arousal in moderating nar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applicability boundaries of the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hypothesis within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Key Words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Policy Narrative; Policy Identity; EEG Experiment; Survey Experiment

Abstract Collaboration is a wicked problem for any modern orga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hina to improve social livelihood and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mega projects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ystematic nature of tasks, strong time constraints, and cross-institutional nature of tasks, and require a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model to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initiated,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nnovativ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party are constructed and u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ajor projects.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has realiz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al task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ong incentiv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status of party member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ga projects in a highly connected collaborative form. As a framework model for cross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not a simple replacement for internal collaboration models such as work teams and leadership groups, but rather a supplement and modification to address major cross institutional tasks that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one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at the meso-level for "how to effectively govern mega projects", forming the meso-level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a's goo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high-level promotion to complete unconventional tasks; On the other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how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Party-led Collaboration; Mega Projects; Unconventional Task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Building Governance Communities on Commercial Streets: Expan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Beyo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Limei Gu & Yuquan Li

Abstract Urban commercial streets have become as vital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a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yet face a key challenge: transforming competing merchants into collaborative collectives. Examining Shanghai’s C Street Council through a “one chain, two loops”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how such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built. The “identity-situation” loop cultivates street identity through role-shaping and strengthen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via spatial design and co-presence. The “issue-emotion” loop channels governance energy by focusing on shared concerns and build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Through role-reshaping activation, cyclical momentum inj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ing, the Street Council balances market logic with public values, demonstrating a local pathway 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from transactional ties to emotional bonds.

Key Words Commercial Street Governance Commu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Urban Governance

How to Resolv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Housing Expropriation Events Bin Lin & Hong Wen

Abstract The compensation for demolition and expropriation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redistributing benefits, which has become a microcosm of th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iffers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power and interest g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but proposes a new explanation of “combined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xecution. Deeply describ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promoting housing expropriation and compensation work around the most iconic demolition event in Chin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dopt a varie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ombining standardized execution, dynamic governance, and creative execution to solve “Wicked Problem” in a phased and targeted manner. Behind this is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direc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sues to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shaping rigid rules for the public, and releasing limited flexibility in internal oper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lexibly adapt to changes in group structure and interest patter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combination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ddressing “Wicked Problem” under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enriches the explo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y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cked Problem; Housing Expropriation; Combination Operation

Can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Qiaolan Liu, Fei Luo & Conghu W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systems. Authorities must advance contingency-

based regulatory reforms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external conditions. However, critical questions remain empirically untested; whether the contingency reform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can enhance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how do its adaptive features correlate with reform effects. This study leverages unified regulatory reform—an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o centralized public resource trading—as an analytical foundation.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s most market-oriented, resource-intensive, and reform-progressive region of regulatory systems for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we employ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mpirically examine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findings include: (1) Unified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ruption, reducing annual duty-related crimes by approximately 4 cases per 10,000 public officials; (2) Moreover,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a higher initial level of corruption; (3) When unified regulation covers two types of projects,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reaches its peak; (4) Unified regulation of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achieve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transfer method has a more significant corruption prevention effect than that achieved through the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method.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advances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on aligning regulatory systems with contextual demands. Empirically, it provides the first systematic evidence of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offer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Words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Unified Regulation; Policy Evaluation; Corruption

● **THEORETICAL REVIEWS**

Th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 Can Li & Yujie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influen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irm behavior based on research on such impacts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Drawing on 252 relevant studies, we find that research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reflects the refinement and evolution of assessment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ing cadr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from singular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to encompass diversified metrics such as regional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micro-level behaviors of entities like firms—including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affects 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social capital available to them, which in turn shapes their attention allocation across multiple goal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ance. Meanwhil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attributes of officials, and firm-specific traits potentially moderate the actu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goals during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leverag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in-depth mining of data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and firm behaviors, decompose governance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exerts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Local Officials’ Tenure; Governance Effect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m Behavior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2008年创刊
第19卷，第2期（总第110期）
2026年4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9 No.2
Published in April 2026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65

04>